

陳布雷先生文集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出版

陳布雷先生文集

定價：精裝新臺幣二〇〇元 美金 六元
平裝新臺幣一七〇元

編輯者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
出版者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一四六一八一號

經銷者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六號
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一八一八一號

承印者：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

臺北縣新店市大坪林寶強路六號

版權
所有

凡 例

一、陳布雷先生早年從事新聞，以文章政論顯名一時；後承先總統 蔣公知遇，得參贊密勿，盡瘁黨國，凡二十餘年，獻替綦多。茲特蒐集所遺著述，彙輯成編，藉窺先生志事之一斑。

二、本文集概分為政論、講演、函牘及雜著等四編。各編文字皆依著述年月先後為序，其月日不能確知者，則置諸該年之後。

三、本文集所收錄文字，均註明來源，俾便查考。

四、本文集卷首選刊陳布雷先生遺像及墨蹟四件，卷末附錄其生前友好之憶述五篇，以供參覽。

五、陳布雷先生生平著述，散佚失稽者至多；本文集之編印，雖已廣事蒐羅，惟遺漏之處，在所難免，尚祈讀者不吝補闕指正。

（此處為極淡之書寫內容，字跡模糊，難以辨識）

傳略

宋晞

陳布雷（一八九〇——一九四八），原名訓恩，字彥及，署畏壘，浙江慈谿人。生於清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（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），卒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，享年五十九歲。為著名新聞工作者、政論家及政治家。

一、求學經過

自五、六歲時開始，由於父兄的督教，先識方塊字，繼誦毛詩與爾雅，八歲從族父小垞先生讀禮記，九歲從徐二沅先生讀完禮記，接讀春秋左氏傳。傍晚讀唐詩，日課一首。十歲接讀書經，始習算，並學作史論。十一歲接讀周易，間亦誦昭明文選。自述有云：「是年有拳匪之亂，每聞大哥（訓正，字屺懷）歸家，與先考談時事，始知中國國勢之大概，亦常自大哥處得閱時務報等刊物，雖在可解不可解之間，顧獨喜閱之。」（注一）翌年，徐師續授公羊、穀梁傳及幾何、三角。冬，徐師以病請假，由伯兄屺懷代課，學作詩，秋日成「苦雨」一絕，曰：「游子浮雲夢不成，挑燈獨坐夜淒清，明朝欲向橫塘路，大雨瀟瀟久未晴。」（注二）

十三、四歲，出就外傳於三七市董氏，董鵠堂授中文，習四子書，閱綱鑑輯覽，均上午課之。姚魯彥授英文及筆算，於下午課之。自習史地及理化常識。董氏書齋新書與報刊盈架，暇輒往

取讀，尤喜新民叢報、新小說、警鐘報、浙江潮等雜誌。老師常誡以：「爲學不可太貪，貪則傷身損智。」但爲求知慾所驅使，每泛濫涉獵，孜孜不輟。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十一月應府試，主試爲萍鄉喻兆蕃，拔置第一。次年二月，至寧波應院試，錄取第五名，爲慈谿縣學生，才十五歲。旋入慈谿縣中學堂肄業，校課午前爲修身、經學、史地與國文，午後爲英文、算學與體操。他說：「余是年於歷史、地理所得最多，地理習謝洪賽所著瀛寰全志一厚冊，歷史閱通鑑輯覽半部，並習萬國史綱目完。」（註三）翌年四月初六，因母以產後症逝世，驚痛不已。自述有云：

吾母柔嘉淑慎，好損己益人，佐吾父拮据持家二十年，以勤將儉，愛令譽甚於其身，思慮綿密而治事周至，育五男六女，卒以產殞，年僅三十有九，鄰里悼泣，出於至誠，吾父之痛，更可知矣。（註四）

回校繼續學業，馮君木（芥）授國文。課餘並問業於馮師之門，得其善誘，獲益良多。

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，入寧波府中學堂肄業，府中學科完備，教師人才亦頗整齊。陳氏入府中後，受知於凌公銳最深，回憶錄（一）有云：「凌先生常勉予專習史地，謂有此基礎，澤以文字，可望深造也。」（頁二一）入學二月後，以新舊生風潮，不得已自動退學。寄寓育德小學凡三閱月，後赴杭州，申請浙江高等學堂爲預科二年插班生。勤奮向學，頗覺讀書之可樂。與邵翼如、邵振青、汪達人、陳君哲、虞梅洲、徐圃雲、林智敏、黃念耘、鄒亞雲、沈柏嚴、胡心猷等爲同學，或以學問才華相慕重，或以性情氣節相投合。陳氏論浙江高等學堂之教育方針，有

云：

吾校教育方針重自治自覺，管理不甚嚴而考試甚勤，自監督、教職員以至於學生，皆重在情感之陶冶而不重形式，全校融化於一種和易之空氣中，亦自然孚洽，鮮有自暴自棄或囂張乖戾超出常軌者。（註五）

他追述浙江高等學堂之學風，對授地理之張閻聲師特別懷念。他說：「吾獨深慕乎先生無施不可之教與其風度之和悅閒雅，亘三十年不能忘。」（註六）次年，清政府將以滬杭甬鐵路借英款建築，浙江各界紛起反對，組浙路拒款會，以力保主權為號召，他被推為學生代表。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夏，預科畢業，入正科第一類（文哲法政）肄業。師資稱盛，如邵斐子教英文，張鏡人教法文及外國史地，楊敬會教國文與經學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洪百克（Stanley K. Hornbeck）授歷史地理及論理學，陳佩忍授中國地理，沈尹默授掌故史（實即文化史）等。

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春赴杭入學，途經上海，寄寓天鐸報數日，對記者生活頗羨慕。為鐵道國有問題，致楊度一書，寄洪佛矢教正，洪為刊入上海天鐸報，並易以課暇常寫文投寄，因之傾向新聞事業之心益堅。是夏，浙江有選送官費生十名赴歐美留學，陳氏經外舅楊敬會之許可，亦往報名。甫試國文、英文、數學三場，為父書所勸阻，以家中弟妹衆多且幼小，不願其出國遠行也。翌年夏畢業於浙江高等學校，旋應天鐸報之聘，任撰述記者。

二、從事新聞工作——從天鐸報到商報（上）

上海天鐸報開辦時，湯螫仙任董事長，社長陳屺懷即布雷之大哥。社務由社長負責，因內部人事不協，社長拮据支持，頗以為苦。宣統三年，社中虧欠甚多，讓渡於粵人漢冶萍公司上海經理陳芷蘭，屺懷辭社長職。按是年春，布雷赴杭過滬，寓天鐸報旬日，以戴季陶婚假，囑代其事，每日撰短評，間亦代撰論說。至秋初，正式入天鐸報，約定每日撰短評二則，每十日撰社論三篇，月薪四十元。

天鐸報在任天鐸報撰文，署名布雷，一月後漸有知者。八指頭陀贈詩有：「迷津喚不醒，請作布雷鳴」句。「布雷」命名之由來，他說：

其實余此二字之別署，乃在高等學校為學生時，同學汪德光君為代擬者，蓋余此時面頰圓滿，同學戲以麵包孩兒呼余（憶為邵振青所創始）。由麵包而 Bread，再由譯音而改為布雷。汪君蓋謂余好撰文字投報館，以布鼓自擬，亦甚有趣味云爾。然後來竟以此名，而訓恩之原名，及君木先生字余以彥及，轉鮮有人知之者。（註七）

居滬上三月，以新聞事業常往請益者為宋教仁，時宋主持民立報編務，編列時事大局，對於國際問題，每多為文論列之，相互印證以為樂。報館工作以外，則與南社諸人如柳亞子、高劍公及神州日報胡寄塵等交往甚密。八月十九日（陽曆十月十日）武昌義師發動，天鐸報在編輯方針上為

傾向革命者，然總編輯李懷霜殊謹慎，以論說欄屬陳氏。布雷遂有撰長文之機會，作「談鄂」十篇，按日刊布之。未幾，浙滬光復，參加張園之民衆大會，識何海鳴、江亢虎等，邵元冲亦偕湘友數人來參加，久始知其爲老同學邵翼如。戴季陶堅勸其赴東北，參佐藍天蔚的戎幕。他不願離開天鐸報而他適。

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，撰發對外宣言，初稿用英文，交王寵惠携滬發表，中文稿卽爲布雷所譯，在天鐸報首先發表者，可見其中英文學力之深。翌日民立報始知之。在天鐸報任事，酬薄事多，而年少鋒芒顯露，遭李總編輯之忌，乃辭職歸里，半年之報館生活，暫告結束。其後戴季陶等創民權報，葉楚傖等辦太平洋報，鄧家彥等創民國新聞，均有邀約相助之意，而陳陶遺、雷季興方接辦申報，亦邀約任撰譯。他聽從鄉人長老之意，回寧波任教於效實中學，間任上海申報義務譯述記者。

任教期間，以課業不重，閱覽西文書報最勤，譯稿寄申報發表，署名彥。蓋是時之主要興趣，仍在新聞事業也。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三月同盟會甬支部成立，加入爲會員。少年氣盛，每逢集會，輒登壇演講，評騭人事。他的老師馮君木，誠以不宜於奔走政治。他深感師言，遂力自檢飭，自後便不作輕易之發言。從民國元年到八年，他在家鄉任教。三年六月丁父憂後辭教職，在家料理家務與族事，自述有云：

今突遭此變，幾如千鈞之任，突然加於肩上，憂思無計，累月失眠，慮以勿克繼承，貽

吾父羞。……以此一念，時縈腦際，憂傷抑鬱，不復能釋。而宏農君驟承家事之重，其柔弱勿勝任亦與余相類，長日嘆吁，無可慰藉。此為余後來神經衰弱致疾之主因。（註八）

甬上友人以其枯守家園，將成心疾，屢招前往效實小住者。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，週末至效實兼課。夏間，何旋卿辭效實校長，同人舉布雷承其乏，但由副校長負責實際責任。民國八年三月應錫卿宗老之約，結伴遊贛，視察祖上所遺江西修水之商業。九月下旬，夫人楊雋人女士以產後症歿，悲憂交加。

三、從事新聞工作——從天鐸報到商報（下）

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）以家事託親戚照料，離家赴甬，再就效實中學聘，擔任教科。上半年兼四明日報社撰述，每日上午在效實授課，下午則至報館寫短評一、二則，隨感五、六百字，日日如此，「為使腦筋不得閒，故逐日工作，不以為苦。」（回憶錄（一），頁六九——七〇）但偶一返里，觸景生情，又不免悲感無端。是年六月應上海商務印書館聘，任韋氏大辭典編譯之職，亦常與人通信論學。時湯節之發起商報於上海，由上海證券交易所趙林士等之資助，設籌備處於上海寧波路，約布雷為編輯主任。於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元旦正式出版，同在編輯部任事者有潘公展、潘更生、鄭逸虎、陳鐵生等人，陳屺懷任總稽核。此為布雷正式任報館工作第二期之開始。

二十一年七月，辭商務印書館職，入中易信託公司任籌備處文書主任。十一月，在寧波與王允默女士結婚，至是破碎的家庭，得以復完，並移家上海，又開始過著新生活。二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商報基礎漸立，銷行日廣，與潘公展等通力合作，社論短評，通暢犀利，最爲讀者所歡迎。中華新報主筆張季鸞見商報所刊論評，許爲「論壇寂寞中突起之異軍」，輒轉詢問，始知爲陳、潘二人，特往訪談，遂相訂交。孫中山先生對商報也異常賞識，曾說：「□□等報，雖屬黨員辦的報紙，可是爲黨宣傳最得力的成績，遠不及商報；商報只是幾個同志在那裏苦撐，可稱爲忠實的黨報。」（註九）是年三月，中易公司結束，改入商務印書館交通科，任第二股股長，司廣告編撰及出版圖書提要審查事，月薪百二十元。

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，湯節之因生意失敗，經濟破產，乃將商報讓渡於新公司，由中國通商銀行爲後盾，由鎮海李徵五任總經理，徐朗西任協理，編輯部中無更動。自本年一起，商報論評改用署名制，他在日報上署名「畏墨」，卽自此年始。六月，辭商務印書館交通科事，改就修能學社之聘，爲國文教員。是年，曹錕進行賄選，商報明揭反對之幟，不避艱危，力持正論，甚爲社會所重視。有云：

他在編輯部裏撰寫時評，連續不斷吸香烟，喝濃茶，吃饅頭，這三件東西下了肚，他的擲地有金石聲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。有人因他直言不諱，怕惹上麻煩，而勸他不妨用曲筆。他說：「主筆不吃官司，不是好主筆。」

他在報業界中，堪稱得起一位寧靜、超脫、堅定而情意十分醇厚的長者。他對同業後進，經常稱兄道弟，從不拿架子，尤富有親愛精誠的精神。（註一〇）

商報在那段時間裏，聲譽日高，任事諸人益奮發自愛，布雷說：「同人相處之和洽，精神之愉快積極，在望平街中爲僅見。」（註一一）他的自信心亦加強，於政治外，漸討論到文化、社會、國際時事及工商諸問題。而一般知識分子及青年，對商報更愛護倍至。他的苦幹精神以及做人處事之態度，更爲寧波幫諸人所傾服。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六月，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傅筱菴有意延攬，經王心貫數度訪談，情不可却，乃兼任中國通商銀行秘書。

十三年九月，齊（燮元）、盧（永祥）戰起，商報以反曹關係，袒浙而抑蘇。但盧軍卒不振，孫傳芳入浙。商報又一貫反孫傳芳，在政治立場上與在廣州之中國國民黨是一致的。這自然引起軍閥的敵視，商報一度因論評激烈，被租界工部局控告而受審於會審公堂，幾遭拘禁，延聘英國律師克威辯護，才罰金了事。布雷的文筆，更爲國內同業所敬慕。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，如國開週報社胡政之，即函約每週撰時評一則，以壯篇幅。是年曹錕被逐，段祺瑞入爲執政，商報以主張去曹，竟得貫徹。對執政府之措施，時時著論，以善意而嚴正之詞評厲之。孫中山先生在不平逝世，商報著論哀悼，對這位手創民國的巨人，備致欽崇，並闢他報之不敬言論。五卅慘案發生，商報每日撰寫評論，指導各界行動，尤能注視事態的發展，和各愛國團體交換意見，把握問題中心，故所發表議論，均能在羣衆中發生影響。是時中國共產黨人亦注意商報，常轉載商報社論

而評注之。且有投函商報，極盡拉攏之能事。他回憶云：「余與公展堅持中國必須以各階級聯合之力量，倒軍閥而爭回主權，全民革命之旗幟終始鮮明。」（註一）久之，中共引誘失效，乃放棄其企圖，轉而攻擊陳、潘等爲小資產階級意識甚濃之分子云。

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元旦，商報出版滿五週年，發行紀念特刊，事先向各方徵稿（註一三）。陳此懷先生撰五週年宣言，布雷自己撰「五年來之回顧與前瞻」一文。商報經濟始終困難，有欠薪紙的情形。國民革命軍北伐，攻克武漢，商報以大字標題記載特詳。他當時患病告假，編務由潘公展獨支。而商報董事中，多與孫傳芳有來往，對編務採干涉態度，編輯人員自潘公展以下相繼辭職，爲其他報紙所延攬。待布雷銷假時，重要幹部走得差不多，仍得勉強支持。葉譽虎（恭綽）在北京聞布雷病，曾助藥資。並謂：「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才寥寥不多得，其論議周匝，文字雅俊者，在北惟顏旨微，在南惟陳畏壘而已。」（註一四）適在此時，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介石派人到滬致意，盼他抽身到贛一晤。是冬，趁年終休刊之便，約潘公展以記者身份同往南昌遊覽，並擬謁晤蔣總司令及黨中諸先進。西行之前，李徵五早辭去總經理，陳此懷也辭去社長，布雷把報館所有經手帳目，列冊交代清楚。北伐軍不久收復上海，商報停刊。

四、擔任教育行政工作

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初抵達南昌，於拜謁張靜江之次日，蔣總司令自牯嶺歸，卽與潘

公展往見，堅邀入黨，由 蔣總司令與陳果夫爲介紹人，隸組織部之直屬區分部。奉命暫留南昌，遷入總部西花廳居住，與張岳軍（羣）、黃膺白（郭）毗鄰。代擬文稿自此始。在南昌發表之告黃埔同學書，「卽蔣公口授要旨而余爲之起草者也。」（回憶錄（二），頁十一）三月，經漢口回滬，青天白日旗幟，已遍十里洋場。時事新報與商報咸邀爲主筆，皆却之。四月，經邵元冲、張靜江二氏敦勸，就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，旋以南京方面電召，任中央黨部書記長。數月之間，陳氏由記者生涯而轉入公務生活，頗感不慣。更以斯時寧漢分裂，他感於國勢之危殆，念革命之多艱，常覺忽忽不樂。八月，蔣公及諸元老相率離都，他也到了上海，應潘公弼之約，在時事新報任特約撰述。對黨的歷史與黨政制度，聞揚獨多；對左派分子之幼稚言論，亦常作嚴正的指責。是年冬，蔣公漫遊日本，事先曾詢及能同行否？以不諳日語而作罷。

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一月，蔣總司令以各方敦促，入京復職，繼續北伐。布雷應約同行入京。蔣公有意以總部秘書長屬之，但被堅謝；又以願任何種職務相詢？他回答說：「余之初願在以新聞事業爲終身職業，若不可得，願爲公之私人秘書，位不必高，祿不必厚，但求能有涓滴爲公之助。然機關重職，則非所盼也。」（註一五）蔣公助成其辦報之志願，留居匝月回滬，乃與時事新報商訂合作之約，任該報總主筆，主持社論。旋又創辦戊辰通訊社，使商報舊人有所歸宿。復與戴季陶、邵力子、陳果夫等創辦新生命月刊。五月三日，濟南慘案發生，首撰「暴日膺懲」一文，以示國論之所在。是年六月，國民革命軍克復北京，隨 蔣公北上，途中代 蔣公起

草辭總司令呈文，到北京後復爲蔣公撰擬祭告總理文，約留旬日南歸。十八年（一九一九），仍任時事新報總主筆，凡所撰著，一以完成革命救國爲立場，言辭精闢，文采斐然，立論力求平實而正確，在革命力量未普遍深入民間以前，於統一國民見解上，最著績效。是年三月，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被選爲中央候補監察委員。七月，隨蔣總司令再赴北平，留平二旬，起草講詞及談話若干篇。及過南京，乃聞浙江省主席張靜江提請爲浙江省教育廳長，蓋大學區制取消，蔣夢麟膺任教育部長，浙江大學之教育行政事務，須移交於新制之教育廳也。回滬後，雖屢辭不獲，然終於擔任者，有感於張靜江主席之懇懇，不忍過拂。遂辭去時事新報總主筆職務，於八月中旬到杭州就職。

在任浙江教育廳長期間，於省政方面，調協各方，疏通隔閡，並力陳人民意見與社會利病於張主席。於教育行政方面，期在安定中求進步，創辦民衆教育實驗學校。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春，第一次全國運動大會在杭州舉行，撰大會宣言，戴李陶譽爲發皇蹈厲之文。考選省費留美生七人，分習應用化學、礦冶、土木工程、電機、機械及水利諸科。是年夏秋之際，以西北軍人抗命，閻、馮聯合稱兵，有隴海路之戰役。蔣公督師柳河，辛勞備至。九月奉命往前線，在鄭州旅次，受命撰擬文字一、二篇。後經南京、溪口，仍回杭州。十月，浙江省政府改組，張難先任主席，仍留任教育廳長。次月，蔣公自兼教育部長，李書華爲政務次長，調布雷擔任常務次長，首次乘郵航機前往牯嶺，蔣公促其早日赴部接事。十二月抵京接事，與李次長極相得。在京任

事，寓中央飯店，所居者為普通旅客之三等室，僅自加一書桌而已。任內以整理學潮及調整大學教育方面較多貢獻。（註一六）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六月，蔣公親赴南昌主持剿匪軍事，中央以李次長署理教育部長，布雷晉為政次，錢昌照為常次。同時，他又被任為中央宣傳部副部長。九月十八日，瀋陽事變發生，中央宣傳部事務頓見重要，他對於宣傳方針之制定及國內宣傳之指導多負責任，並擔任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。因此，在中央黨部辦公時間多於在教育部。他自稱：

此一時期中，余在職務上偏重於宣傳方面，間亦奉蔣主席命辦理特種文件之撰擬，每日工作常在十二時以上。所歉然於心者，則身為教育次長，未能助李代部長平息學潮，致使首都要地，發生毆辱中央大學校長、教員等事件耳（註一七）。

那年十二月十五日，中央常會通過蔣公請辭本兼各職，二十四日，四屆一中全會選任林森為國府主席，孫科為行政院長，布雷也獲准辭去教育部政次職務，但仍命回任浙江省教育廳長。浩然返滬，與家人團聚。未幾，新任浙江省主席魯滌平，催他到杭接事。乃於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元月，再到杭州，重作馮婦。

「一二八」上海事變前夕，南京政樞動搖，蔣公會發表「獨立外交」論文。蔣公不忍中樞擾攘無主，乃與汪兆銘相約入京，共同負責。既抵京而滬戰起，政府決定遷洛陽，蔣公仍在京坐鎮，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。布雷先生應召到京，任軍委會秘書長，獲准暫不必到任，因此他在浙江兩年多，對浙省教育得以及時推進，頗愜素願。是年夏，遷入小蓮莊，與大哥訓正同住，